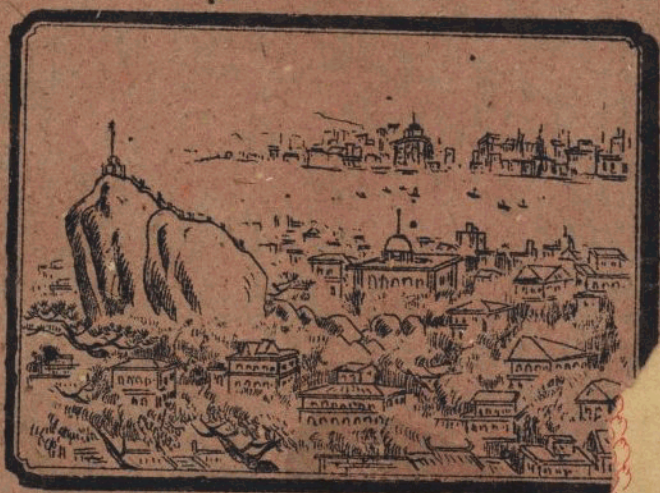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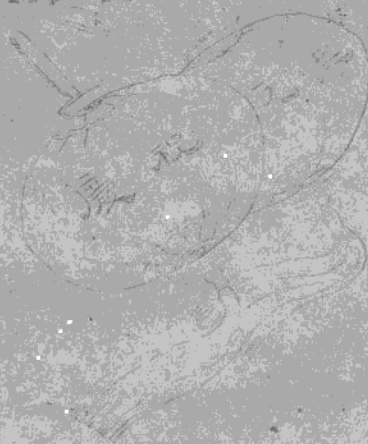
廈門史料輯錄

第二輯



廈門市政協文物委員會
博物館籌備處 合編

欢呼三面红旗 的伟大胜利



1961



PDG

目 录

- 厦門新石器時代遺物的发现----厦門大学人类博物館
- 一 日帝侵略厦門史料类輯-----厦門大学历史系資料室編
- 日寇在厦門的种种暴行-----鍾 文 献
- 清文宗实录有关福建
- 小刀會起义史料选輯-----厦門市博物館筹备处編
- 一 有关厦門汇丰銀行的一些資料--厦門市人民銀行档案室
- 提倡國貨和抵制洋貨的回忆----莊 金 章
- 一 厦門印刷业发展簡况-----葉潤澤作 吳远之整理
- 厦門歲時風俗瑣記-----施 緝 亭
- 陈三五娘的遗迹-----林 頌
- 一 厦門史料选译:厦門对外关系(二)--方 文 圖 譯
- 厦門軼聞(三則)-----李 禧
- 稿 約

廈門新石器時代 遺物的發現

- 3 -

廈門大學
人類博物館

廈門見於記載很遲，《廈門志》說廈門自宋以前无可考，宋代始有嘉禾屿之称。郑成功据金門、廈門二島以抗清复明，故改廈門為思明。清代以后又改称廈門，沿用至今。据此，廈門見於記載不过自宋代开始而已。但民间传说更早些，传说唐末陈黯曾来廈門，又南普陀寺也始建於唐代。

其实廈門有人类居住也是很早的，文献雖无徵，地下的古物却可以証明这。廈門不但在宋代以前已有居民，甚至在三千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也已有人类。廈門新石器时代遺物的发现在我國長江以南也是相当早的，这些情形都是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所知道的。

1930年，林惠祥教授在廈門大學担任人类学課程，在教学中常需要实物如石器时代遺物等供学生参考，因以前林惠祥教授在菲律宾时曾亲察过石器时代遺址，又因前一年他曾赴台湾高山族并发现新石器时代石器，乃在廈門大學附近一带考察，1930年冬天，廈門蜂窠山与南普陀山之间开马路通廈市，林惠祥教授在蜂窠山向廈港的斜坡上发现一件石斧，这件石斧長5.5，闊3.2，厚1厘米，質是泥板岩，色已因風化成灰黃，还有红棕色的斑，硬度中。人工明显，全件有磨，完整无缺。形状是长方形，双凸扁平，左右对称，四边都平直。一凸全平，一凸在右边都有輕微斜削，在鋒口处斜削更大成薄鋒。上端手握处厚，其边亦平。這樣的石斧可称是薄边的石斧，边是指左右两边，是在发展中途的石斧，发展更高者其边也有棱，更美观。

1931年，林惠祥教授在南普陀山东凸东边社斜坡上又发现一件石斧，形状与上一件相同，但略缺，不过人工还很明。質也相同，色因風化成灰色，比上一件略大，長7.6，闊4.1，厚1.7厘米，全件

成鐮形，有四邊，左右對稱，二凸都扁平，有一邊磨得很平。下端傾削鋒口，可惜口部被缺不全。

這二件石鐮發現後，林惠祥教授因材料較少，未曾發表，到了1934年廈門大學鄭德坤作校址考，說及這事，並將照片也刊出，載於大校刊內，但文中未詳細敘述。到了1938年春林惠祥教授在南洋加遠東史前學家第三屆大會，提出武平新石器時代遺址論文時，連帶舉這二件作比較，並陳列供眾鑑定。這二件廈門新石器時代的石鐮發現後，未曾正式發表，故國內學術界都未曾知道，若就發現時間而論，在長江以南的發現中可算較早的。

解放後，自1952年以來，陳嘉庚先生為廈門大學添建校舍，工翻動土已，林惠祥教授又在新建大禮堂地基后斜坡上連續發現新石器時代陶片三件，分述如下：

第一件：4.5×3.3×0.4厘米，色黃，質松，无釉，表凸有隆起的幾何紋樣作“V”狀，判法是手捏，表凸不平勻，且有指痕，所說它是石器時代物，是因其質松，无釉，其紋樣是手工所制，不印模的，且又是手捏的，不用陶輪，新石器時代以後的陶器不都是這樣的。

第二件：4.7×3.8×0.5厘米，色灰，質也松，无釉。表凸有成的雷紋。也是手捏的不用陶輪，但用模印，時間應較后。

第三件：似是陶器的耳，色灰，无釉，質松，是手捏的，指紋還印在上凸。

1953年3月，桂光華又在新建大禮堂前土凸上，發現一件石斧，這件石斧人工非常明顯，長9.8，闊5.7，厚2厘米。色因風化灰，質是泥板岩，形長而扁，上端略狹而厚，下端落而闊。兩凸平勻，而且在下端二凸都斜削成斧口，边无稜角，呈渾圓的，二凸是很長的橢圓形，故近屬圓筒狀斧，但略扁。這件石斧的發現證實了二十餘年前的二件石鐮，並証明上述在近处发现的

1954年，厦门修建海堤，在厦门岛西北角的高崎地方，工人在掘土中发现三件石锛，内一件系弧形双石锛，长12，阔4.4，厚1.3厘米，质是泥板岩，呈浅绿色，加工很细致。形状是长方形，一面有尖突起，一面平坦故，左右二边斜削，锋口平直，双口成弧形。这件石锛的制法很工整美观，在福建出土石器中并不多见，后由海堤指挥部转送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保存。

1957年，曾厝垵农民在农田翻土中发现扁平石锛及石鏃残段各一件，送给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保存。这件扁平石锛长8.5，最阔处3.6，厚1厘米，也属泥板岩，表面风化成灰色，形状上狭下阔成梯形，两面扁平，双口斜削，锋口微缺。石鏃残段长5.6，阔4.5，厚2.2厘米，质很坚硬，成三角形，应为石鏃尖端，剖面成椭圆形，这种石器在福建发现还不多。

1958年2月，在南普陀附近五老岑又发现常型石锛一件，长5.5，阔4.2，厚1.5厘米。青灰色，二面二边都扁平，棱角明显，上端手握处略狭，下端锋口斜削成锛样口，人工极为明显，中部微缺。这件石锛与最早发现的二件形式很相近。

此外，孕放后林嘉祥教授在厦门大学校址附近发现一件疑似旧石器，系手斧形状，器身已打制，尚未琢磨，一面扁平，一面凸起，锋口微缺，极似旧石器时代物。因缺乏地层根据及共存物，现在不能就下结论，有待今后进一步的发现和研究。

上面所说的是厦门岛上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应一该附带提到的是在厦门附近灌口地方，在1957、1959年曾先后由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研究人员及历史系师

生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印纹陶、彩陶片等，材料不少，这些发现也证明了厦门岛上新石器时代遗物的发现并不是偶然的。

从上面的发现，可见厦门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有人类居住过，他们的足跡差不多踏遍厦门島的周圍，如現在西北角的高崎，東南角的廈門大學校址、南普陀、東邊社、曾厝垵等。就遺物發現的地點來看，大多靠近滨海的小山丘或平地上。

廈門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物種類有石鏃、石斧、石鏟及陶片等，雖然數量還不多，但參考福建南部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遺物，也可看出當時人類是經營采集天產物和漁撈的生活，也可能已有原始農業。他們一定常到海邊來捕捉魚蟹貝類海產物充當食物，所以在這些地方留下他們的石器、陶片等物。從石器琢磨精光及陶片上精緻的花紋，反映了這時候人類的生活和文化水平已相當高。

廈門新石器時代的人類是屬於哪一種族呢？根據福建地區其他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結合文獻記載研究，應該是古代越族或越族祖先。越族不同於華夏族，有自己的生活和文化特點：他們斷发文身、多食海產、善駛舟（原始獨木舟）、巢居、有自己的語言……。

至於這時的社會組織，根據一般新石器時代的情況，當時人類是過着以血緣為紐結的民族社會生活，同血統的人聚集組成民族、部落，共同勞動。這時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階級，沒有剝削，也沒有國家，一切東西歸全族所共有，就是過着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

上述的石器和陶片，現在都陳列在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內，可供大家參考研究。（林惠祥遺著、陳國強整理）

日帝侵略厦門 史料類輯

厦大历史系資料室編

厦門是通商口岸之一。在帝国主义侵略厦門的历史上，英国、日本和美国是三个主要的国家。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提出福延“不割让”照会，以福延为其实力范围，从此日本在厦門的势力日益擴大。到了1938-1945年，厦門淪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个时期中，日本的侵略罪行是罄竹难书、擢髮难数的。这里，仅就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以前，日本侵略厦門的史料，初步加以彙輯，以供研究者的参考。

一、政治侵略方面

早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已经注意厦門。1874年日本兵船借口操兵駛入厦門港，并在厦門沿途測水。1891年又派兵船登陸厦門，駕大砲於虎头山，当时由於英德等国領事出面交涉才不得不撤走。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以福延为势力范围，並以福州、厦門为据点，擴大侵略。

(一) 佔領租界：

1896年中日兩國所訂的“公立文牒”規定：“中国政府亦允，一經日本政府咨請，即在上海、天津、厦門、汉口等处，設‘日本專管租界’”

1898年以“日本、台湾商务日減”为借口，要求設立专界，清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势力，終於签订了厦門日本

专门租界条款，其中规定：“界内所有马路、警察之权及界内诸段行政之权，皆由日本政府管理。”接着，日本企图强佔虎头山一带为租界，受到厦门人民的反抗，造成了1899年驱逐日本领事的“虎头山事件”。

1900年又签订了租界续约章程，规定不许“不安本分的清国人”在租界内住家、开店，否则由清朝地方官和日本领事官会同查办。同年，日本又派兵登陆，进驻街市，企图用武力来巩固他们的租界。

(二) 侵犯主权，干涉内政：

日本领事有会审的权利，续约规定：日本人“因被清国人民欺凌稟控，以及清国人民在租界内违犯章程，由清国地方官会同日本领事官或领事官所派之员会审”。后来，日本领事竟然在中国政府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突然宣称被告是日本籍民，出面干涉，并威胁清政府“毋徒迁延，以致惹起不好的结果”。

日本领事馆设立警察所的事件，是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突出事件。

1915年日本以约束日侨为借口，在厦门设立“大日本驻厦门警察所分所”，非法逮捕人民，行使所谓“警察管辖权”。1916年厦门各界人民曾经开展反对日本设警的斗争。但是日人置若罔闻，1921—1922年又加强警察所的活动，派来“警视”和警察，声音要“永驻”厦门。1928年日本警察在厦门拘捕中国人，并将其中二人押去台湾。这些侵犯主权的行爲，激起人民的愤怒，开展了反对日本侵略国权的斗争。

1932年厦门民国日报、厦门商报登载朝鲜独立宣

言，日本领事认为“对日皇不敬”，进行干涉，要求勒令停刊，并由厦门警备司令正式道歉。1937年日本领事又干涉厦门报纸上的言论，认为“对日不利，易引起日人不良观感”，要求市长予以纠正。

(三) 派遣大批移民，扩大侵略势力：

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以后，不断地派遣大批日本人和受他们指使和支配的台湾人来到厦门，这种移民的人数是日益增多的。

1905年厦门共有外侨1,912人，其中英国人364名，美国人35名，而日本人佔1,426人（可能是包括台湾人在内）。

1914年厦门外侨为685人，其中英国人123人，美国人80名，日本人262名（不包括台湾人），佔第一位。

1916年厦门外侨为767人，其中日本人278名。

1924年据美国人统计，厦门地区（包括漳泉等地）外侨共6925人，其中日本人和台湾人为6,253名。

1930年底在厦门的日本人有354人，台湾人有7,476人。

1933年9月，日本海軍省发表，在厦门的日侨为3,000人，台湾人8,700人。

1936年6月，厦门外侨共10,641人，其中日本人828名，台湾人8,874名。

这些人组织成所谓“侨民会”、“居留民会”，在日本领事的指挥下，进行各种阴谋活动，扩大对厦门的侵略。

(四) 扰乱社会秩序，进行间谍活动：

从二十世纪以来，日本侨民在厦门无恶不作，到处横

行，他们的罪行是写不尽说不完的。日本的所谓“居留民会”，原为在闽的情报机关，会员多借侨居经营之名，分任侦察及捣乱等工作。

据统计，居留在厦门的日本籍民（包括台湾人），“其中操正当营业及安分谋生者，仅十分之二三，余皆创设烟厠、赌场、娼寮种种违法生活”。国民党当局也承认：“厦门烟赌娼三权，完全握于台人之手，预料取缔前途，仍恐棘手。”除此以外，走私、抢掠等罪行，也经常出自日本籍民之手。1920年有二十多个台湾流氓在镇邦路抢劫银钱庄，被劫去二万多元。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当局为了配合其政治活动，指使厦门“台湾居留民会”加紧走私、扰乱、侦察等破坏活动。

日本在厦门的间谍活动也是很猖獗的。他们曾经设立间谍训练班，收买流氓、土匪，进行罪恶活动。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还派了高等特务侦探山崎来厦门，极力联络台湾流氓头子十八大哥，组织“华南青龙会”，进行侦察破坏等活动。后来日本政府决定，为了迅速获得情报，将厦门领子改由台督直接指挥（原由东京外务省指挥），于是间谍活动更加活跃，从日本派来的间谍、侦探，也不断增加。日本特务原田幸雄还利用敬佛为名，在厦门组织“敬佛会”，联络各地流氓土匪，从事各种破坏活动。

此外，日本为了准备夺取厦门，派人来厦组织“自治政府筹备处”，购置军械，联络各地土匪，阴谋进行武装暴动，配合日军占领厦门。

（五）收买笼络地方官绅：

日本除了派来了大批移民以外，还极力收买、笼络地方官僚绅士，作为扩大侵略的帮凶。日本派来一批“中国

通”，专门从事这种工作。日本驻厦门领事馆书记官山吉藏义（即米溪）的活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米溪在厦门四年，“公余辄与都人士过从，畅饮商吟，结为神交，当他回国时，厦门及附近的官僚、士绅、官人等纷纷为他饯行，还专门刊印了“送米溪先生诗文”一书，为他歌功颂德，说他“睦邻修好，誼篤邦交，不辱君命也”。可见米溪的活动是有成效的。日本通过这批“中国通”的活动，在厦门上层人物中笼络了大批的亲日份子。

（六）武装恫吓、施行“砲舰政策”：

日本政府依借其军事势力，经常派遣军舰和水兵，对清政府或国民党政府实行武装威胁，以便扩大其势力。

1900年为了霸佔虎头山租界，借口日本教堂被焚（其实是日本领事指使教徒自焚的），派水兵登陸，进行恫吓。后来，在厦门人民反对日本设立警察所和抵制日货时期，也不断派军舰来威胁。1923年日本组织所谓“侨民自卫团”，携带武器，扰乱治安，和厦门保卫团发生冲突。日本海军借口保护侨民，派来军舰，並下令水兵携砲登陸，以武力逼迫厦门当局禁止人民抵制日货。1924年，厦门军警搜查私带军械的日本籍民，日本又派巡洋舰、驱逐舰等来厦门示威。

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本军舰更是经常驶来厦门。1934年先后有大批日舰来厦，水兵登陸“遊覽”，並且声言海军陆战队一联队准备“常川驻厦”。1935年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到厦门活动，日本军舰经常出入厦门港。厦门海关缉私船曾经数次被日舰包围、监视，甚至开砲威胁。1936年8月日本军舰68艘来厦门“会操”，以后又连续不断地派军舰、舰队司令等来厦门活动，以“砲

舰政策”对国民党政府施行压力。

二、经济侵略方面

日本在经济侵略方面也不遗余力，他们创办银行，控制金融财政；设立洋行，大量倾销商品；走私漏税，扰乱市场。尤其是在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以后，日本人认为他们已经获得“在华之资本优先权”，经济侵略更加发展，不论大小企业、商店和各种行业，他们都极力加以控制。因此，日本人也承认厦门是日本人投资活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

(一) 创办银行，控制金融财政：

1899年9月日本创办了台湾银行，10月就派了行员赤羽定教来厦门筹办支行。1900年1月成立支行，这个支行控制了金融市场，办理内外汇兑，进行企业投资，发放企业贷款，调查本省各地的经济情况。厦门支行还曾经擅自发行银券，票额有一元、五元、十元和五十元四种。这种银券通用于本省沿海各地。后来，福建当局向台湾银行借款，以全省茶税收入为担保，茶税是福建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台湾银行通过贷款实际上控制了福建的财政。

此外，日本的华南银行、新南银行也在厦门设立了分行。

(二) 设立洋行，大量输入商品：

日本在厦门设立了许多洋行，经营汇兑、保险、水产、谷物、棉布、药材、杂货、茶叶、石油、食堂、烟草等等。在抗日战争前夕，厦门思明西路一带成为贩卖东洋货的中心市场，形成一个“特区”，在这里，完全是日本人的势力，中国政府无法干涉。

日本著名的三井物产公司在厦门设有办事处(1902年)

专门经营樟脑贸易的三五公司，也设在厦门。据1917年前后统计，较大的日本洋行有台华殖民合资会社、广黄堂、相原洋行、久光堂、日龙公司、旭昇洋行、谦丰洋行、岛坊洋行、岩泉洋行、义裕洋行、永昌洋行、祥记洋行、福万源洋行、南国公司、九一洋行、日东洋行等数十家，以后还不断增加。

由于日本洋行势力的强大，本地商人纷纷挂出日商牌号作为庇护。1906年厦门华商挂洋商牌号者有340家，其中挂英国牌号的53家，美国的10家，而挂日商牌号的有239家，佔第一位。

日本商品输入的情况，还可以从轮船进出口吨数看出来：1899年进出口为187,836吨，1914年增至589,241吨，1921年为710,269吨，最高为1930年达890,298吨，以后略有降低。这些进出口吨数仅次于英国，佔第二位。

从商品进口总值来看：1919年日本从厦门进口总值为1,624,433元，比英、美都多。1935年厦门海关输入总值为14,836,567元，其中日本佔第一位达2,159,163元，台湾为1,276,813元，而英国只有1,102,405元，美国只有947,525元。1936年日本佔输入总值的第二位，仅次于德国。1937年也是佔第二位，仅次于香港。

(三) 走私漏税，扰乱市场

日本的商品输入多数是通过走私进行的。日本大阪商船会社以及日清汽船会社的船只，经常进行走私活动。

在抗日战争前夕，台湾总督府驻福建的特派员桑原义夫等提示，日本侨民必须“切实扶植走私之进展”，作为

政治擴張的前提。由此可見，日本的走私活动不仅扰乱中国的市场，而且为其政治阴谋服务。

由于走私的猖獗，日本货充斥市场，对国計民生起了重大破坏作用。因此，在五四运动以后，厦门不断发生抵制日货运动，但是並沒有制止日本的走私活动。

除此以外，日本驻厦门领事曾经活动筹建铁路，企图夺取路权，也曾经极力促成包厦航空的实现，以便夺取航空权。日本的高船公司开辟了从台湾到厦门以及从厦门转衡方各地的航线。这一些都说明了日本企图从交通运输方面，控制厦门，以便扩大他们的侵略。

三、文化侵略方面

文化侵略是日本整个侵略政策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企图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人民的思想，培养亲日份子，以便于他们的奴役和统治。

1908年日本在厦门创办了“全闽新日报”。这是日本重要的宣传机关，日本人承认它“对敦睦邻谊，指导民众的任务，有所贡献”，可見它在毒化宣传上起了不小作用。1915年日本人也办了台湾公会报，这个报纸由台湾人经营，由日本人担任主笔。1917年又办了一个中和报。1924年出版了南支那周刊。这些都是日本的宣传工具，文化侵略的工具。

日本人在厦门办了几所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是1910年创办的旭瀛书院，这是日本人在厦门培养亲日的知识份子的主要场所。在抗日战争前夕，日本人决定扩大旭瀛书院，创办其他学校，“培养亲日之人民”。

1918年创办的博爱医院，是日本人以慈善事业为掩护，麻痹人民思想的机构。日本人特地从台湾总督府每年拨

给一批经费，可见这个医院在他们文化侵略中佔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936年日本松井大将来福延，向日本侨民演说，提示必须向人民宣传“大亚细亚主义”，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侵略野心。

四、侵略厦门的目的

日本侵略厦门，除了企图掠夺和奴役厦门人民以外，还有更大的野心。他们企图利用厦门的特殊地位，扩大对华南各地的侵略，巩固其在台湾澎湖的地位，排挤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为日本向南扩张和争霸太平洋建立基地。

具体说来，其目的是：

第一、巩固日本已经夺取的土地。“福建省与台湾、澎湖为一水之隔，倘被他人割夺或租借，则不但有碍日本对于中国之发展，必有危及台湾澎湖之虞”：日本侵略厦门，正是为了保持其在台湾海峡的势力。

第二、扩张日本在华南的势力。日本人承认“以福延地势而论，关系殊多，浙江则为中日交通之始，盈盈一水，三日即至，故日本勇于福延浙江保其势力”。美国人认为：“从福延势力范围来说，取得铁路建筑权，就会使日本的影响伸入江西、湖北和广东等省。”

第三、为侵略南洋、争霸太平洋建立基地。“日本之所以关切福延的港口，是因为日本海軍界打靶在佔取它之后，削弱菲律宾的軍事意义”。同时，有利于日本向南洋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攻。

資料來源

中外旧约章彙編。 对华回憶錄。 义和团第四册（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 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 鮑爵姆金：古界外交史（第三册）。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 送米溪先生詩文。 威罗貝：外国在华特权和利益。 樋口弘：日本对华投資。 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二輯下 汪敬虞編）。 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別全誌 第十四卷 福建省（日文版）。 日本外務省通商局：福建省情（日文版）。 台湾总督府熱帶产业調查会：南支那の資源と経済 第一卷 福建省（日文版）。 P.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英文版)。 J. Arnold: CHINA, 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book (英文版)。 江声报。 申报。 上海历史研究所：大量史料長編草稿。 福建師院：福建人民革命史資料。 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現代政治史料彙編。

更正：

本刊創刊号厦門轅閩厦門船塢条「在厦港海墘寺」句应作「在厦門鹭江道」。